

龔鵬程 主編

#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龔鵬  
程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1 冊

三國時期魏地文士「惜時生命觀」研究  
—以建安七子與曹氏父子之詩歌為研究對象

丁威仁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三國時期魏地文士「惜時生命觀」研究——以建安七子與曹氏父子之詩歌為研究對象／丁威仁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民100〕

目 2+142 頁；17×24 公分（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輯；第 1 冊）

ISBN 978-986-254-574-4 (精裝)

1. 詩歌 2. 三國文學 3. 生命哲學 4. 詩評

820.91

100015344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輯 第一冊

ISBN : 978-986-254-574-4

三國時期魏地文士「惜時生命觀」研究  
——以建安七子與曹氏父子之詩歌為研究對象

作 者 丁威仁

主 編 巍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1 年 9 月

定 價 第十輯 20 冊 (精裝) 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三國時期魏地文士「惜時生命觀」研究 —以建安七子與曹氏父子之詩歌為研究對象

丁威仁 著

## 作者簡介

丁威仁，1974 年出生於基隆。東海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現任新竹教育大學語文系專任助理教授，兼通識中心主任。曾獲 2005 年第 27 屆、2007 年第 29 屆聯合報文學獎新詩組評審獎，九十年度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新詩組首獎，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等。學術研究方向為中國古典詩文理論與批評，魏晉與明代文學、台灣現代詩、現代文學、網路文學、中國古代房中思想等。出版詩集《末日新世紀》(文史哲出版社)《新特洛伊・New Troy・行星史誌》，以及論文專著《明洪武、建文時期地域詩學研究》、《戰後台灣現代詩史論》。個人網頁為：<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php/kylesmile/>

## 提　　要

生命意識發展史是構成文、哲學史的重要部分，文學中所表現的生命問題，不僅是作為一個單一的命題討論，而是必須認識到生命觀與生命價值的追尋，是構築一個人精神本體的基質，決定了他的行為方式、價值觀念以及人生境界的理想，也對其審美觀照產生了影響，因此，從研究典型生命人格與群體性生命問題入手，便可以形成文學史的一個嶄新思路，這也是跨學科研究的一種嘗試。筆者在碩士論文的撰述過程裡，提出的討論命題，即是惜時生命觀的系統思維，此文裡架構了一個「惜時系統」將魏晉文人對於生命價值的追索，以及生命意識的思考，作系統化的整理與歸納，並且利用此系統作初步性基礎階段的分析與論述，討論的焦點集中於三曹時期北地的文士生命意識，並以曹氏父子與建安七子作為典型，採用他們的詩文作為觀察文本，輔以其生命歷程的考察作為佐證，討論一般所認為的建安時期（在文內以三曹時期作較為精確的處理），北地文士所普遍呈現的乘時意識，進而去補充發明學者所稱建安風骨時代，是一個乘時思維為內在價值根源的進取時代，在撰述過程中，幸蒙授業恩師王文進教授、以及尤雅姿教授的悉心指導，獲益甚多，並藉此使筆者思考未來繼續處理此一命題的可能性。



# 目 次

---

<b>第一部份：惜時系統的建構</b>	1
第一章 緒論	3
第二章 惜時系統的完成	9
第一節 自然災異頻仍	10
第二節 多元政治角力	15
第三節 生命本質覺醒	19
第三章 乘時系統的思想基礎	29
第一節 品評人物的價值思維	30
第二節 自然與社會的多元時間觀	38
第三節 回歸原始儒學的新生命	44
第四節 縱情任性之風與希冀隱逸的對照呈現	53
第五節 小結：外王功業主流價值系統的完成	58
第四章 乘時系統的文學基礎	63
第一節 生命悲劇意識的本體觀照	64
第二節 傷逝悲感消解的集體思維	66
<b>第二部份：惜時典型之觀察</b>	73
第一章 建安七子內化的傷逝悲感	75
第一節 義界問題	75
第二節 生命流寓的現實思考	77
第三節 生命時間意識的浩歎	81
第二章 曹操詩歌裡的生命憂思	89
第一節 生命情調的萌發	90
第二節 生命價值的定位	94
第三節 生命存續的精神	97
第三章 曹丕生命的自我求索	101
第一節 生命能量的質變	102
第二節 生命意義的完成	106
第三節 生命型態的內聚	109
第四章 曹植生命的掙扎矛盾	113
第一節 生命結構的萌芽期	114
第二節 生命結構的完成期	117
第三節 生命結構的復甦期	124
第四節 小結	127
結語	129
參考文獻	133

# **第壹部份：惜時系統的建構**



# 第一章 緒論

本文的研究範疇可分數點加以說明與澄清，首先提及的是三曹時代的義界問題，就歷時性的角度討論斷代，<sup>[註1]</sup>在筆者的思考中可

---

[註1] 從歷時性的角度言之，亦即是談論事件的連續性，如何去組構出一個文化思維與時代意識？而事件的發生又和整體的文化、社會思潮有何重大的聯繫？亦或是受到此思潮的影響？這些討論在歷時性的角度上是互動而相涉的，縱使是斷代的定位，每一個被定位的斷代，實際上也是一首連續性的史詩，在史詩裡以一中心主旨去貫串說明歷史片段如何銜接的疑問，進而構築出所謂的「時代思潮」，其中所有的事件、人物，似乎都應被史家處理成此共相思潮下的一個環節，殊相則成為典律之外的歧出。請參拙文〈詩史、詩社、詩潮、新世代〉，發表於海峽兩岸詩刊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建會主編出版，頁1~2。而文學史上所標誌的建安文學，大體上與本文所義界的時序相同，指涉的是漢獻帝建安元年至魏明帝太和七年近40年的時間，據學者的分期，可劃為三個時期：建安元年至十三年為前期，悲壯慷慨是主要的思維基調；建安十四至二十五年為中期，為鄴下時期，政治相對穩定，作品的現實意義衰弱；從黃初元年至太和七年，則是建安文學的尾聲，透過曹植反映了積極的功業追求已然被苦悶的生命詠嘆所取代。當然，亦有學者持不同意見，認為第一階段為漢靈帝中平元年至漢獻帝建安九年，為形成期；第二階段從漢獻帝建安十年至二十二年，為全面發展階段；第三階段從建安二十三年到魏明帝景初三年，為衰弱期。筆者因為此時期的文學與生命思維有這因人、因時、因地而異的豐富變化，所以筆者以三曹時代去取代過去習稱的建安文學，以充份概括此時遇討論的各種問題意識，而對於分期的觀念，筆者則以前者的說法作為基礎。可互參〈從三曹七子到二十四友——試論魏晉文人集團與文學精神的演變〉，李中華

分成歷史斷代、文學史斷代、與思想史斷代而言。就此時期在文學史的斷代上，多半以建安、黃初、正始作為討論文風的界線，建安時期所討論的重點集中於建安七子與曹操、曹丕及未禪代之前的曹植等人，但黃初時期的討論則集中於曹植本身文風的不變與影響，至正始時期則是以嵇康、阮籍作為代表的竹林七賢作為分析處理的對象。當然，曹氏父子、建安七子與竹林七賢便成為文學史家著力的重要構成部分。而本文所提及的三曹時代，則是屬於歷史意義的義界，意指漢未禪讓魏之前，以曹操主政的建安時期；魏成立後以曹丕稱帝的黃初時期；以及曹植去世前的曹叡太和年間，作為本文三曹時代的定義。此三時期在整體文化氛圍裡，可以說是建安風骨的開始與完成；在個體意識的發展言，三個階段政治與文化的變遷也影響了三個階段呈現出不同的思維風貌，因而筆者所言的三曹時代時可包含漢末以降，至於建安七子、曹氏父子等重要文學史代表作家，而避免採用建安風骨作為概括，也正是在於此三個階段的文人生命思維之發展，並非單線式地呈現簡單的傳遞關係。為了反映此時代整體生命思維的狀態，便選取了這種歷史義界的方式作為分析的依據，希望能夠確實地處理一些前人所遺留的問題。

從共時性言，<sup>(註 2)</sup> 地理空間當然是一個研究中需要注意的問

---

著，收錄於《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月刊》1995年第9期，頁97～103，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1995.10.20；〈近年來建安文學研究綜述〉，王巍著，收錄於《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月刊》1994年第3期，頁126～131，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1994.4.20。

<sup>(註 2)</sup> 共時性研究的詩史學者，著眼於空間坐標，所以力圖去建立各系統思維之間的關係與結構，在長時期的編年過程裡去定位形成斷代的可能，在已被定位的斷代中，去重現各集團群體的互動場域、界限、層次、觀念的區隔和辯證是如何組構出一個斷代的整體風格，這是共時性史家著力之處。引述來源同前註。又，近年來關於三曹時代文學的研究，已逐漸形成多元化的狀態，大概可以分成幾個方向：文學的源流；文學的成就、地位、影響與藝術特色；發展階段的分期探討；三曹個別研究、建安七子研究、建安風骨研究等討論方向，

題，其義界在本文的脈絡中必須加以說明，而不同地理空間所呈現的景物氛圍，的確會導致相異的人文質素與文化意識傾向。而所謂的「北地」，實指曹操所統治的中國北方領域，從曹操組成青州兵，並在官渡之戰後，建安九年（204）克鄴，於次年平定冀州，次年取得并州，後北征烏丸，且擊潰關西的韓遂、馬超，於是曹操所能控制的領域大致形成，亦即是青、司、雍、涼、荊、豫、徐、兗、幽、并、冀，以及揚州的一部份，這樣的地理空間可以說是占了中國大部分的北方地區，而在歷史思考上漢魏承襲了中原思維的正朔，就文學史、思想史的思考也多以漢魏作為主要討論對象，與此配合的地理空間定位，當然在本文中也限制於曹魏統治的北方區域，即是本文簡化後所提出的名詞——「北地」。

本文的討論對象則集中於三曹時代的文士，文士相對於武官而言，未必在政治與軍事上有任何的才能、功業與建樹，但至少這並無法能夠與其文學上的才華相比，吳質《答魏戈子箋》所言甚切：

陳、徐、劉、應……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  
若乃邊境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註3〕

的確，這句話便把對於所謂文士的定義給明確地作了功能上的分類，而三曹時期的文士多半存在建功立業的惜時生命思維，亦多半沉鬱下僚而不得其遇，這使得他們在生命中出現了各種的矛盾與掙扎，也提供了本文討論的可能性與價值所在，所以本文以建安七子作為一章便

---

當然在這些討論中，也多數會提及此時期文士對於生命的思維與觀照，然而也多半成為旁證與附屬的討論地位，本文則採取逆向思考，以曹氏父子與建安七子的詩歌作為工具，並配合對於當時社會文化與思想背景的處理，去觀察此時期文士普遍存在的「惜時生命思維」如何透過「乘時」的價值思考去消解「傷逝悲感」，與生命內在的掙扎與痛苦。關於三曹時期文學的研究概況，請參〈近年來建安文學研究綜述〉，王巍著，收錄於《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月刊》1994年第3期，頁126～131，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1994.4.20。

〔註3〕 引自《魏晉南北朝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頁38，1996.10。

是欲分析文士面臨生命掙扎的思維，面對價值系統無法完成的困惑。當然針對權力結構不同、權力場域的位置歧異的政統控制者而言，他們也在共同的文化社會的意識張力網裡與文士群體彼此互構，然而正因為地位的相異，導致了關於惜時生命思維的不同思考，而他們往往又是政體的領導者，而實際上他們也並不背離具備文士的身分，曹氏父子便是筆者所分章論述的重點，他們和其他諸多作為臣下的文士彼此互構交集並激盪出整個生命思維場域裡的各個分子，而其中曹植雖然具有王室身分，但因為特殊的生命氣質與生命經歷，相對地存在著多種的矛盾與糾結，透過對於他惜時生命思維的解剖，我們可以補充前述討論的不足處，也可以做一個整體性的觀照與巡禮。而透過本文所選擇討論對象的分析，筆者將會力圖呈現與勾勒出三曹時代整體性惜時生命思維的結構面貌，以補充發明前輩學者在此時代的各類型論述所得。

在本論文中的討論主題是透過惜時系統的完成而被定義的，在第壹部份本文將會提出這個系統，加以說明。就本文的論述而言，此時代的文士共同普遍呈現出「傷逝悲感」的生命情調，對於時空有著極為高度的敏感性，於是在他們的作品中，透過各種題材與客體對象的描寫，往往指涉的就是關於惜時的主題。正因為如此，此主題在筆者的思考中其實是一個較為龐大的系統，在這個系統模式裡，由於討論對象與時空的限制，於是大都集中在此時普遍呈現的「乘時」生命思維裡，並兼及應時式的「及時行樂」思維模式，透過人格典型的提出與其作品的佐證，本文在第貳部份時，企圖探討此時文士所內在「惜時生命觀」所呈現出的共向與殊向，並藉此論述來還原此時其文士的真實生命面貌與價值根源的歸趨。

本文在撰述過程裡，採用的方法與模式是交錯並互構的；首先，筆者將會提出一個惜時主題系統作為本文討論的架構與未來研究的可能方向：此一架構的完成藉由史傳的援引，對於當時社會、文化、政治等各場域狀態的還原，去作為本文立論的基礎；另一方面筆者透

過討論典型生命歷程的整理，以其詩文作為研究文本的重要部分，去觀察其生命在活動中與各場域的互動與影響，進而去思考其人格結構的形成；第三，筆者透過當時文化思想意識的認識與檢討，去找出討論對象與此時普遍性思想的互構又為何？展現出的生命氣質又如何呈現？當然，筆者透過原始史料與此時重要文士作品的基礎處理，作為援引的依據，以此對應筆者所提出的立論與看法。因筆者在文中討論的方向與角度的多重變換，所以筆者並不以單向的方式去建構思維的基礎，而是在文中經由多重交錯方法的運用，以期能夠去整理出本文的論點與問題意識，並透過此系統的完成與首次的討論，深入並補充過去對此時代研究的些許不足，當然本文的完成闕漏在所難免，但希望藉此作為筆者研究的真正開端，相信在未來的研究當中會更加的嫋熟與完整。

或許，有論者將會認為本文的討論可區分為彼此不應相屬的兩個研究系統，一為三曹時期北地土人的生命意識，此屬於思想哲學研究的範疇；另為文學母題與內在情感，此為文學研究的領域，而此兩種研究均有其研究之方法，在本文似乎呈現出繁複混沌的狀態。筆者在此必須加以說明，首先，透過文學母題的討論去反映此時文士面對環境所呈現的內在情感，原是一種探索的方式，然而我們不當割裂其於本體生命意識的關係，本體所內蘊的生命意識，往往便透過內在情感的勃發，形諸於文字、語言或者藝術作品之後，才成為研究者所討論的對象客體物，假使此一推論可能成立，那麼這兩種範疇之間便不再存有矛盾糾結的方法難題。雖然如此，由母題回溯的研究方式，不為本文論述所採用，本文所提出的系統實際上是透過外部環境以及文化思潮所完成架構的，作為文學基礎的母題討論，也是此架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但並非是由此作為方法運用的起始點；且第貳部份典型的觀察，本為架設本文之研究命題，並非純粹處理文本的賞析與討論，而是以此既相屬於文化環境卻又彼此分殊的典型人格，去涉入並對應第壹部份的系統提出。而以典型人格的詩歌作品作為討論的工具，也

正源於中國詩歌言志抒情的思維系統，透過對於詩歌的分析，去討論典型人物內在的生命意識，並以此去豁顯本文系統的結構性命題，辨證此時群體性生命思維的端緒，應是本文所研究的重點，如有對於章節、資料的配置混沌，前景、背景之安排籠統、複沓，或是命題與本為內容對應關係不足等疑問，這或許是本文在處理上，未來應亟思的改善之道，也的確希望本文可以作為此後研究此一命題的濫觴。

## 第二章 惜時系統的完成

「傷逝」是文學作品的永恆母題，人類在有限的生命當中，往往對於死亡的經驗抱持著畏懼或是疑惑的態度，所以在有限的生命進程中，人類對於生活裡的紛雜煩擾，便採取不同的應對方式。於此，人們常常思考一個問題，即是如何透過他人之死亡去感受觀照內心的畏懼，透過他人之死亡去衡量、消解這種畏懼，並提出策略去完成未知的生命進程：

在海德格爾那裡，任何情感的泉源是憂慮（angoisse），它是對存在的憂慮〔恐懼屬於憂慮，它是憂慮的一種變形〕。

〔註1〕

實際上，憂慮的導生並非從任何無關的它者所引出，多數的人們總是探索著時間所代表的意義，想要去追尋死亡的意義為何，於是死亡便成為了一個不確定的問題，是生命時間流動中對於真實的人的未知，既然是未知，人類在關注時間的問題時，向外則從他人之死去推測存在物毀滅的經驗，向內則對自身的生命進程作一反省與思考，弔詭的是，這種思考卻「只能通過對外部世界的認識才能達到」。<sup>〔註2〕</sup>這種透過自身內省式的思考，對生命無常短促的深刻感受，代表著人類個

〔註1〕 艾瑪紐埃爾·勒維納斯著，余中先譯《上帝、死亡與時間》，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4，頁10。

〔註2〕 引自滕守堯《審美心理描述》，中國社科出版社，1985，頁368。

體自覺與生命意識的覺醒。「死是生的前提，只有在此關係中，即在不斷的毀滅中，創造之力才會生機勃勃。從而生成（werdem）與消亡（Vergehen）是相互關聯著……」<sup>[註3]</sup>在這基礎上，人類開始對生存價值與生命定位有了高度的關係與思考，開始去追求生命的自由，希望能夠超越生命的痛苦，所以「惜時」正是人類在個體意識覺醒後，對生死問題的某種抵抗與超越。

「儒學中衰，造成大一統觀念的瓦解和思想的大解放，於是生活情趣、生活方式皆有顯著之變化。由於倫理觀念淡化了，自我意識覺醒了，在生命意識、價值意識、情性意識方面，都走向新變突破的道路……自我覺醒、及時行樂之餘，遂有生命短促、世事無常之哀感。在人生觀的轉折改易中，悲情意識也獲得了消解與昇華」，<sup>[註4]</sup>對於生命價值展開獨立思考，實是三曹文士所普遍面對的心靈問題，本章從三個角度申說在此時形成「惜時」觀念的因素，以及提出一每惜時系統去處理本文此後的討論。

## 第一節 自然災異頻仍

我們試著把這個最基礎的認識，放在本文的脈絡當中，其實經過漢末的亂離，社會倫理的結構徹底崩解，作為政統的中央政體（state）系統瓦解後，導致相對平衡的社會機制（society）系統亦出現崩離的狀態，<sup>[註5]</sup>在兵連禍結、哀鴻遍野的情形下，穩定社會文化的政統

---

[註3] 引自《詩化哲學》，山東文藝1986年版，頁198。

[註4] 論者認為，建安時期悲情意識形成的內因外緣，有四個方面：處世橫議、喪亂頻仍、儒學中衰、以及任情縱欲。筆者則在此章討論惜時系統完成的諸多問題，則提出三個思考面向，其餘關於惜時系統思想與文學的背景基礎，則留待下章處理。請參引〈建安詩人的悲情意識——以三曹七子的詩歌為例〉，張高評著，收錄於《第三屆中國詩學會議論文集——魏晉南北朝詩學》，國立彰化大學國文系編印，頁183～222。

[註5] 就本文所言的state系統，指涉的是中央政權的統治機制與模式，亦包含政體控制場域的意義，例如漢代的皇權統治模式，其統治方式

機制不再成為控制的力量，原本作為社會機制（society）系統的經學道統也呈現出疲弊的姿態，人們就必須去正視自我生存與生命該如何安頓的問題。因為政統的崩解，人們在漢代被社會化建構的道統觀念與價值標準，隨時可以解消，於是文學主題便回歸到以人們每日面對的現實作為題材來源。據筆者初步的統計，東漢安帝至獻帝除了在政治上使得土人生命面對朝不保夕的情況外，自然災異的不勝枚舉更讓多數的平民百姓，也面對著生命隨時可能消逝的不確定狀態。雖然，自然災害次數的多寡，實無法強調自然災害流行之普遍，然而筆者以量化統計出的發生頻率作一分析，的確可以反映出區域性的社會結構，因接續不斷的災害與動亂，而無法恢復元氣的現實狀態。而建安年間的災害發生頻率相對於前代而言亦呈現出較低的情況，此時的北地政治情況也相對地逐漸穩定，由此可知若以中央政體（state）與社會結構（society）情態相互參照，確可證明自然災害對於社會結構的影響與刺激。筆者援引《後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鑑》等史書，簡略整理東漢末自然災異的狀況為下表：

帝王	年號	災異狀態	備註
漢安帝	永初	地震 6，旱 4，雹 2，山崩 1，水 5，飢荒 1，蝗 3	7 年 22 次
	元初	地震 6，旱 5，雹 1，水 1，蝗 2，疫 1	6 年 16 次
	永寧	地震 1，雨 1	1 年 2 次

幾經更迭，但均不妨害皇權的最高指導原則，直至漢末皇權因亂離而瓦解，新的中央統治系統：挾天子以令諸侯於是誕生，直到魏文稱帝，又進入了另一種改朝換代的集權統治機制。而所謂的 society 系統，亦即是中央統治機制的地方管轄範圍，亦指涉社會結構整體的狀態，而地方官吏即是中央統治機制的分身，然而 society 系統卻又受到地域性文化的縱深影響，例如地方豪族或士族的勢力，地方性沿習已久的風俗習慣等等的干預政治性的地方運作，使得 state 系統在維繫 society 系統時，有著相對應的複雜思考。我們在分析此時代的任一情況與文本時，情境分析模式的考量是必要且須關注的。而本文採用 state 與 society 作為分析的方法之一，並不欲給閱讀者帶來困擾，故就此處作一說明。